



永不停止的对话

——德里达关于诠释问题与伽达默尔的对话与分歧

邓 刚

摘 要: 伽达默尔与德里达之间有过几次重要的对话和交锋。伽达默尔还多次撰文探讨他与德里达的分歧与共识,而德里达则在2003年的《公羊》一书中,通过对策兰一首诗歌的诠释来展开与伽达默尔的对话。诠释的对象和诠释的方法,在德里达这里是书写和解构,在伽达默尔处则是文本与阐释。对伽达默尔而言,理解和诠释文本,最终是为了理解存在,而对于德里达,他所说的“文字”、痕迹、延异,先于存在者和存在并使之成为可能。

关键词: 德里达;伽达默尔;公羊;策兰

中图分类号: B565.5;B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7)02-0059-10

熟悉伽达默尔的人都知道,他与德里达之间曾经有过几次重要的对话和交锋。两位哲人的首次相遇是在1981年4月25—27日召开的“文本与诠释”国际学术会议上。受法国学者福格特(Philippe Forget, 1953-)的邀请,伽达默尔作了《文本与诠释》的报告,德里达向他提了三个问题,伽达默尔对三个问题逐一回应。此后,伽达默尔又发表了两篇重要的文章,分别是1985年的《解析与解构》和1986年的《诠释学与逻各斯中心主义》。1988年2月初,两人再次在海德堡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相遇,会议的主题是“海德格尔与政治”,由于议题原因,两人间未出现理论的交锋。汉语学界关于两人间的论争已有基本的资料和相关讨论。最重要的当属孙周兴和孙善春收集并翻译的《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对上述文章悉加收录,足以了解论争双方的主要观点。国内首部研究伽达默尔的专著——严平的《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述评》中,也辟有一节讨论^①。戴登云、陶渝苏、张沛^②等学者的论文,从多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孙周兴在《德法之争》一书的后记中写道,“事后几年里,伽达默尔对他与德里达的这次巴黎论战一直念念不忘,以相继作了《致达梅尔的信》、《解析与解构》、《诠释学与逻各斯中心主义》三篇文章,意在重梳他与德里达的异同,进一步回应来自德里达的对解释学哲学的解构论挑战。不过在德里达方面,似乎没有迹象表明他对此事件有进一步的反应”^③。后记写于2003年。然而德里达方面并非没有回应,只是他的回应姗姗来迟。2002年,在伽达默尔逝世之际,德里达向这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表示了敬意,他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他是对的!伽达默尔,我的西塞罗》的纪念文章。德里达写道:“我们在1981年会面时他对我的答复作出了以下的回应,我想说我对之完全

① 严平. 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述评.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254页以下.

② 戴登云. 哲学话语的解读可能性——以德里达与伽达默尔之争为导引(上、下).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4);2009,(7). 张沛. 阐释的僭政与意义的流亡:伽达默尔 vs. 德里达.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5,(2). 陶渝苏. 意义追逐与文字游戏——从德里达与伽达默尔之争看德法哲学的不同旨趣. 贵州社会科学,2005,(1).

③ 伽达默尔,德里达. 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 孙周兴,孙善春,编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66.

同意,而且满怀对他的善意、微笑的大度和敏锐心智的敬仰。”^①2003年2月5日,在伽达默尔逝世1周年之际,海德堡大学举行了一场纪念伽达默尔的学术会议,德里达出席并作了一场报告。这个报告的文本,同年以《公羊》(*Béliers*)为题在巴黎出版,此书的副标题为《永不停止的对话:在两种无限之间,诗》(*Le dialogue ininterrompu; entre deux infinis, le poème*)。

在很多学者看来,两位哲学家的首次相遇,解构和诠释学的这次狭路相逢,是一种“不太可能的论争”(improbable debate)^②。正是邀请两位哲学家赴会的福格特对此次交锋作了如此的评价。在1981年的会议上,德里达显得富有攻击性。对此,《德里达传》的作者解释说,这是因为整个1981年德里达都处于“似乎是最糟糕的情况”。首先是事业上的挫折:他申请了巴黎第十大学的教授职位,但并不顺利,最终获得职位的是研究马克思的拉比卡(Georges Labica)。其次,在此期间,他的身体也饱受疾病折磨。也许身体与心灵的双重不适使得德里达在会议上表现得咄咄逼人。但是,如果尝试阅读德里达的其他一些文本,我们会发现他对伽达默尔和诠释学怀着较为温和的态度。在某种较宽泛的意义上,他的哲学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诠释学。我们知道,德里达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是“书写”(écriture)。而德里达本人的“解构”实践,通常也是通过对一些哲学和文学的文本进行重新解读来展开的。在2003年底的一篇谈话中,德里达说道,“确实,我对于诠释、解读、阅读、诠释学,有着兴趣和义务感,不只是通过阅读在书本之中的文本,而且首先是在生命之中、在我所说的‘广义的书写’”^③。在《公羊》一书中德里达首先谈到,他和伽达默尔之间都分享着某种“没有年代的忧郁”,是他那一代人所普遍感觉到的。回忆起两人在1981年的相遇,德里达承认,他们之间的讨论一开始就是一种奇怪的断裂,自己所说的话,只是间接地与伽达默尔相关。但是,德里达却感受到在他与伽达默尔之间,已经有着一种奇怪而浓烈的分有^④。因此,在德里达看来,他和伽达默尔之间,应该有一种内在的对话。

一、德里达在《公羊》中与伽达默尔的对话及对策兰的解读

德里达在《公羊》一书的开场白中提到,他希望和伽达默尔之间能够展开一种内在的对话。那么,怎样才叫内在的对话?在第一部分,德里达明确地说:就是“让伽达默尔在我之中说话”^⑤。德里达首先引述了伽达默尔在《解析与解构》(1985)一文的最后一段话:“尤其是,我们在我们时代丰富壮大到新的伟大的合作伙伴(他们来自全球性扩展的人类遗产)的对话,理当广泛地寻找它的会话伙伴,特别是那些与我们自己完全不同的对话伙伴。因此,那个让我关心解构的人,那个执着于差异的人,他站在对话的开端处,而不是在对话的终点。”^⑥德里达在他的引用中特别强调了“对话的开端处”。在德里达看来,这样一个不断地寻找对话者的人,这样一种不断寻找对话的经验,远远不会轻易就达到一种和谐的对话,而始终是一种“缺失的”经验、一种错过的“相遇”。德里达进一步把这种经验称为“无家可归的”(unheimlich)^⑦。

1988年,在《解构与诠释学》一文的开头,伽达默尔指出,他和德里达所进行的对话是由许多特殊困难组成的。伽达默尔说:“在思想和诗歌领域,当有人试图突破传统框架、朝向新方向迈进,总是会存在着极大的障碍。”^⑧德里达强调,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伽达默尔用的词是思想和诗歌,而不是科学或哲学,因此,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的线索,诗歌是否是一条通过思想的道路?接下来,德里达也将讨论诗歌,

①伯努瓦·皮特斯. 德里达传. 魏柯玲,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93.

②MICHELFELDER D P, PALMER R E, eds. Dialogue and Deconstruction, The Gadamer-Derrida encounter.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2.

③DERRIDA J, GROSSMAN E. La vérité blessante ou le corps à corps des langues, entretien avec Jacques Derrida, in Europe, Mai 2004(901): 19.

④DERRIDA J. Béliers. Paris: Galilée, 2003: 10.

⑤DERRIDA J. Béliers. Paris: Galilée, 2003: 13.

⑥此处译文采自伽达默尔,德里达. 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 孙周兴,孙善春,编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100. 据法文本略有改动.

⑦这个概念来自于海德格尔. 参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9: 218(第40节).

⑧DERRIDA J. Béliers. Paris: Galilée, 2003: 16.

诠释策兰的一首诗歌，他的诠释能否为我们提供由诗到思、由文学到思想的道路呢？他所解读和诠释的对象，是策兰收录在诗集 *Atemwende* 中的一首短诗：

Grosse, Glühende Wölbung
mit dem sich
hinaus-und hinweg-
wühlenden Schwarzgestirn-Schwarm:
der verkieselten Stirn eines Widders
brenn ich dies Bild ein, zwischen
die Hörner, darin,
im Gesang der Windungen, das
Mark der geronnenen
Herzmeere schwillt.
Wo-
gegen
rennt er nicht an?
Die Welt ist fort, ich muss dich tragen.

译文^①：

火红的，大天穹
带着
冲出重围的
黑压压的大片星辰：
在一头公羊的化石额头上
我用火烫了这个图案，烫在
两角之间，那里面，
随着曲折回荡的歌声，那
凝结的心海之髓
也波涛澎湃。
有
什么
它不能冲破的呢？
世界已去，我只有扛着你。

伽达默尔也有一本解释策兰的书，书名叫《我是谁，你又是谁？评策兰的 *Atemkristall*》^②。在书中他承认，“诠释学解读应该考虑不只一个断裂”^③，“这种解读，将会让一系列的问题处于悬置，这些问题是也是意义的解读之中的断裂”^④。这里，德里达回应了他在 1981 年所提问题中的第三个，“理解的条件，——远非关联的持续——是不是更多地是一种关联的断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作为关联的断裂，一种对所有中介作用的扬弃呢？”^⑤。德里达接下来指出，在伽达默尔本人对策兰诗歌的解读之中，也存在着断裂和悬置。这种断裂，既给出解读，又拒绝被解读。“在某种悬而未决之中被认出的，正是诗歌本

① 此处译文采自：保罗·策兰诗选，孟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② GADAMER H-G. *Wer bin ich und wer bist du? Kommentar zu Celans *Atemkristall**, Franckfort; Suhrkamp, 1973.

③ DERRIDA J. *Béliers*. Paris; Galilée, 2003; 34.

④ DERRIDA J. *Béliers*. Paris; Galilée, 2003; 34.

⑤ DERRIDA J. *Béliers*. Paris; Galilée, 2003; 21-22.

身,而不是诗人或者读者”^①。

在德里达看来,这种悬而未决(l'indécision),表面看来似乎是中断或者悬置了解读和阅读,但实际上却保证了未来的解读。“悬而未决,总是在于一种谨慎的、警醒的期待,准备着走向于另一条道路,准备着倾听另一种话语……”^②这种话语原本是不可知的、无法听到的、无法翻译的。因此,悬而未决不是使问题僵化,而是使问题运动起来、活动起来,从而释放出“无限的运动”。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也强调“对话的无穷无尽性”,在《语言的边界》一书中又称为“无限的进程”。

接下来,德里达自己开始解读策兰的这首诗。在德里达看来,解读一方面需要形式的进入,从形式分析入手,这种分析主要从语法、语态、用词、文体、风格来入手;另一方面,更需要一种撒播式的读—写,朝向某种不可还原的剩余或者超出^③。而这种剩余的超出是任何一种诠释学都有的^④,正是诠释学使得这种超出成为可能。

例如,针对第5—10诗行:

在一头公羊的化石额头上
我用火烫了这个图案,烫在
两角之间,那里面,
随着曲折回荡的歌声,那
凝结的心海之髓
也波涛澎湃。

德里达指出,这几句诗行充分体现出意义的剩余和超出。这里描述了一个行动,需要结合《圣经》来解释。在公羊的两个角之间到底是什么?这可以解读为对《旧约》中献祭场面的某种暗示。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让他带上自己的独生子以撒前往山上,把以撒献给上帝。亚伯拉罕在杀死自己儿子献祭之前,突然神呼叫他,让他放下刀,停止伤害自己的儿子。接下来,“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⑤。此外,公羊的意象还可以让人联想到《利未记》中的“替罪羊”:[亚伦]……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藉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⑥由此可见,对犹太人而言,公羊是一个有着丰富而深厚文化底蕴的意象。此外,在《旧约》中,羊角还是一种乐器。号角的音乐,令犹太人想到忏悔,所以让人心潮澎湃。通过对这些意象的分析和引申,德里达写道:“于是,每个犹太人都感到处在一切的边缘,在生与死之间,如同处在重生与结束之间,处在世界与世界末端之间,世界末端即对他者或者他本人的取消。”^⑦

当然,上述这种解读并不是一种唯一的、最终的、确定的解读。实际上,由于诗中的每个词语、每个要素、每个意象都充满着多义性和歧义性,我们可以提出无限多的解读可能和解读方式。解读一个文本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在德里达看来,每一种可能的解读都是在提出一种假设,都是一种断裂。这些断裂,这些假设,既是一种打开,又是一种关闭。

在浏览了《公羊》一书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思(思想)与诗(诗歌)的关联,通过解读策兰的诗歌,德里达继续着与伽达默尔的深入对话。表面看来,德里达在这里所做的,首先是一种表态,强调他与伽达默尔以及诠释学之间应当开展一种“内在的对话”的良好意愿,并且这种对话是一个无限的过程,表现

① DERRIDA J. Béliers. Paris: Galilée, 2003: 36.

② DERRIDA J. Béliers. Paris: Galilée, 2003: 38.

③ DERRIDA J. Béliers. Paris: Galilée, 2003: 47.

④ DERRIDA J. Béliers. Paris: Galilée, 2003: 47.

⑤ 参见:旧约:创世记(和合本).第22章.

⑥ 参见:旧约:利未记(和合本).第16章.

⑦ DERRIDA J. Béliers. Paris: Galilée, 2003: 64.

出一种和解的态度。他和伽达默尔一样，都热爱策兰的诗歌，在对策兰诗歌的诠释中已经显示出一种解构版本的诠释学。但是，另一方面，德里达在保持与伽达默尔对话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拉开了他与伽达默尔之间的距离。为了更深入地揭示出这一点，有必要借助德里达的其他文本，揭示德里达关于诠释的主要观点。对德里达和伽达默尔来说，至少有两点于他们是有交集的：第一，两人都很关注文本；第二，两人都有某种诠释的方法。因此，接下来的讨论，将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1）对德里达而言，什么是书写？解读和诠释的对象是什么？（2）如何面对书写？如何面对文本？也就是说，应当如何进行解读和诠释？前一个问题涉及的是诠释的对象；后一个问题涉及的是诠释的方法。

二、德里达的书写概念

德里达在早期的现象学研究中就发现了书写概念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德里达翻译了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一文，并为该文撰写了长篇的引论，于1962年出版。考虑到引论的篇幅几乎是译文的6倍多，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篇引论视作德里达的第一部著作^①。之所以选择胡塞尔的这篇文章，德里达后来回忆道：“因为这里有着关于书写的短而简略的评论，关于对于学者共同体而言从数学对象的直观出发建立起一些可沟通的观念对象的必要性。胡塞尔曾说过，唯有书写能够给予这些观念对象以最终的观念性，唯有书写能够使这些观念进入历史：观念的历史性来自于书写。然而，胡塞尔的这段评论仍然是晦涩的、充满歧义的，因此我尝试去形成一种书写的概念，这个概念既能够让我考察在胡塞尔那里发生的一切，也能够考察那让我感兴趣的问题：文学的文字（inscription）。”^②德里达之所以对结构主义也有不满，原因之一就在于结构主义忽视了书写概念：“在那时候，有着人们所说的结构主义，代表者是列维-斯特劳斯、拉康等人。对于在结构主义中所发生的东西，我既有所同感，也深怀兴趣，同时，我也感觉到，让我倍感兴趣的书写概念对于这些伟大的论述仍然是未知的、被忽视的。”^③

德里达和萨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文学和哲学都抱有强烈的兴趣。萨特的理想是希望同时成为司汤达和斯宾诺莎，那么德里达就是想同时成为尼采和卢梭。少年时期的德里达就已经阅读过大量文学作品，特别是纪德、卢梭、瓦雷里、尼采等人的作品，他意识到尼采猛烈地攻击卢梭，但却试图在二者之间进行调和。“我问我自己，一个人如何能够同时成为尼采主义者和卢梭主义者？”^④后来，德里达考入巴黎高师，他的梦想仍然是能够同时从事文学和哲学。“于是，伟大的榜样，就是象萨特那样，同时从事文学和哲学。”^⑤正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和敏感，使得德里达在后来的思想生涯之中不断地出入于哲学与文学之间，通过延异、解构、痕迹等概念，呈现给我们一种别样的思想。在另一处访谈中，德里达指出：“某些操作，某些文学或诗歌的意象有时使得我们思考到某些关于书写的哲学理论所未能认识到的东西。为了分析关于分析的传统阐释，书写与哲学、文化以及西方政治思想之间的本质联系，就必须既不能被限制在哲学之中，也不能被限制在文学之中。”^⑥

德里达如何理解书写概念，让我们回到他的处女作《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青年时期的德里达十分关心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当他从事现象学研究时，试图使现象学奠基在更严格的基础之上，因为他觉得萨特等前一代学者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理解有些简单化。在《几何学的起源》一文中，胡塞尔提出的问题是：“以内在于心灵的方式所构成的构成物如何达到特殊的、作为观念对象性的交互主体性的存在呢？”^⑦因此，需要有一种持续的方式，使得观念对象获得一种持久的存在。在胡塞尔看来，书写具有这样的功效。“书写的语言表述或记载的语言表述，其决定性的功能在于，它无需直接或间

①当然，更早的还有德里达在1953—1954年期间写作的论文《胡塞尔哲学中的生成问题》，但这部著作迟至1990年才得以出版。

②DERRIDA J. Sur parole, instants philosophiques. Paris: Edition de l'aube, 1999: 21.

③DERRIDA J. Sur parole, instants philosophiques. Paris: Edition de l'aube, 1999: 21.

④DERRIDA J. Sur parole, instants philosophiques. Paris: Edition de l'aube, 1999: 18.

⑤DERRIDA J. Sur parole, instants philosophiques. Paris: Edition de l'aube, 1999: 19.

⑥DERRIDA J. Points de suspension. Paris: Galilée, 1992: 84-85.

⑦德里达.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 方向红,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32.

接的个人交流便能够使传达成为可能,它可以说成了潜在样式的传达。”^①胡塞尔的理想是,语言在书写之中最好是单义性的,这样才能使得记录在语言或文字之中的真理重新呈现出来。但是,德里达指出,胡塞尔的想法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语言和文化总是充满歧义的。多义性或者歧义性表明的是“某种生成以及被遮蔽的过去的深邃性”^②。而且,即使满足了这种单义性理想,这种单义性反而会是对历史有害的。“绝对的单义性本身只有会有这样一个结果:在无定限的贫乏的重复中使历史发生麻痹并失去创造能力”^③。在德里达看来,有着两种极端化的选择:(1)像乔伊斯那样,承认语言的多义性,并且主动地利用这种语言,在一种多义性的迷宫之中来深入地考察文化;(2)像胡塞尔那样,将经验语言加以还原,还原到单义的、透明的要素,在一种现象学的直观中重新把握到生活和文化的源头。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德里达指出,顺着胡塞尔的道路前行,也会发现“绝对的单义性是不可抵达的,惟有作为康德意义上的理念才有可能”^④。这样,绝对的单义性就是类似康德的理念一样,成为某种前提,使得经验文化和历史本身的多义性成为可能。而在经验中,即使是通过彻底的现象学还原,也只能得到相对的单义性。这样,书写的场域也就成为这些理念的场域,这个场域是一种“无主体的超越论领域”(champ transcendantal sans sujet),这个概念出自伊波利特。德里达接下来写道:“书写,作为绝对永恒的理念对象性的场所因而也作为绝对客观性的场所,构造了这样一个超越论的领域,同时,正是从书写或其可能性出发,超越论的主体性才能得到全面的表达和呈现。书写是超越论的主体性的一个条件。”^⑤

德里达在1953至1967年期间进行了大量的现象学研究。这段时间研究的主要成果体现在,通过对胡塞尔的解读和批评,在哲学上取得了重要的理论突破:“差异”原理(《胡塞尔哲学中的生成问题》,1953—1954)、“延迟”原理(《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1962)、替补现象(《声音与现象》,1967)^⑥。也是在这一时期,德里达对书写的概念作了重新的考察和定义。在《声音与现象》中德里达进一步指出,诸如空间、时间、身体、世界,都处在某种纯粹的差异之中。这种纯粹差异,既没有源头,也没有同一性,是一种不断差异和差异化的运动,同时也是这种差异化运动使得主体成为可能。主体、时间都只不过是这种差异化运动的痕迹。“活生生的当下(le présent vivant),是从其与自身的非同一性出发涌现出来的,是从持存的痕迹的可能性之上涌现出来的。这种当下总已经是一种痕迹。这种痕迹,如果从某种当下的简朴性出发,是无法得以思考的,这种当下的生命是内在于自身的。活生生的当下的自身就其源初来说就已经是一种痕迹。……必须从痕迹出发来思考源初存在,而不是相反。这种元一书写是在意义的源头起作用的。”^⑦同样,书写也是这样的一种痕迹,而使书写成为可能的这种差异化运动,就是一种“元一书写”(archi-écriture)。

在《声音与现象》中出现的这种差异及其运动,在《论文字学》一书中被进一步表述为“延异”。“与我们所说的延异相比,在者和存在同样是派生的。……延异才是更‘本源’的东西,但我们再也不能将它称为‘本源’,也不能称为‘根据’”^⑧。同时,德里达也对他的文字学对象,即所谓“文字”进行了阐述:“现在我们往往用文字表示这些东西:不仅表示书面铭文、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的物质形态,而且表示使它成为可能的东西的总体;并且,它超越了能指方面而表示使它成为可能的东西的总体;并且,它超越了能指方面而表示所指方面本身。因此,我们用文字来表示所有产生一般铭文的东西,不管它是否是书面的东西,即使它在空间上的分布外在于言语顺序,也是如此:它不仅包括电影、舞蹈,而且包括绘画、音乐、雕塑等等文字。”^⑨概括言之,德里达的文字概念,似乎对应人类文化活动的各种生成物的总和,不只是包

①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方向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3.

②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方向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76.

③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方向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76.

④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方向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78.

⑤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方向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63.

⑥参见方向红.幽灵之舞:德里达与现象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⑦DERRIDA J.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Paris:PUF,1967:95.

⑧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2.

⑨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1.

括通过语言文字表示出来的,而且也包括通过符号、图象甚至建筑表示出来的。正如同海德格尔指责西方传统遗忘了存在,德里达指出西方传统从未提出彻底的文字问题^①。德里达的文字概念大体上有下列几个特征:

1. 文字不同于语言。在批评索绪尔继承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同时,德里达指出:“文字并非言语的图象或记号,它既外在于言语又内在于言语……甚至在与能指联系起来之前,书写符号概念就已经包含人为痕迹的要求,这种要求构成了所有意指系统的共同可能性。”^②

2. 文字和符号是“无目的性的”,但也并非完全无目的,而是自身是自身的目的。“痕迹是它自身无目的的无限生成过程”^③，“我们应当将痕迹的无目的的生成过程理解为一种活动,而不是理解为一种状态,理解为能动的运动,理解为动机的排除,而不是理解为既定的结构”^④。

3. 痕迹“既非自然的东西,也非文化的东西,既非物理的东西也非心理的东西,既非生物学的东西,也非具有灵性的东西”^⑤。

4. 文字作为痕迹,意味着起源的消失。源头或者元一书写,作为源初的东西并不存在,或者说只能作为幽灵存在,作为某种潜在(virtuel)之物。之所以有痕迹,正是因为有记忆,有对当下之物的持存。“这是原始的痕迹。没有时间体验的最小单元的保留,没有将对立作为对立而保留在同一物中的痕迹,差别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意义就不可能产生。”^⑥

5. 文字是无主体的,无作者的。每份文字都是一份遗嘱。

三、解构与诠释

我们知道,德里达对许多经典作家作过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解读,他解读出来的结果总是令人惊叹不已。他的这种解构式诠释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学科方面: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宗教、政治;历史跨度方面:从古希腊到当代;地域方面:从法国、德国到美国、南非等。他涉猎文献的数量和解读的深度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正如罗伊尔所说的,德里达总是用“巨大的耐心和巨大的欢愉去描述和解读特定文本的境况。……他是个尖锐而细心的读者,也是个犀利的文本诠释者”^⑦。

在《明天将会怎样……》一书中,德里达谈到了如何面对文化遗产的态度。“首先要重新肯定(réaffirmer)那些在我们之前到来的事物。”^⑧什么是“重新肯定”?“不只是接受这种遗产,而且要将其以另一种方式发扬出来,使之保持活力。不是选择(因为遗产的特征就在于,人们无法选择它,而是它选择我们),而是保持其生命活力”^⑨。因此,这种重新肯定既是一种延续,又是一种断裂,倒是与黑格尔所说的扬弃有近似之处。

方向红指出,差异、延迟、充替三个原理构成了德里达早期解构思想的核心要素。他还进一步指出“解构并不仅仅是解(de-),是摧毁和破坏,它同时也是构(con-),也是重新聚焦和重新建构”^⑩。在《致一位日本友人的信》中,德里达对解构一词作了较为系统和详细的说明^⑪。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解构一词是对海德格尔的 Desstruktion 或 Abbau 的改写。其次,德里达阐述了解构与结构主义的关系。因为当他在《论文字学》中首次提出解构这一概念时,正是结构主义流行的时期。因此,解构显然是一种反结构主义的行动,是对结构的取消、解体。但另一方面,解构也是一种重组、重构、建构。事实上,德里达并不

① 德里达. 论文字学. 汪堂家,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63.

② 德里达. 论文字学. 汪堂家,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64.

③ 德里达. 论文字学. 汪堂家,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65.

④ 德里达. 论文字学. 汪堂家,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70.

⑤ 德里达. 论文字学. 汪堂家,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65.

⑥ 德里达. 论文字学. 汪堂家,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89.

⑦ 罗伊尔. 导读德里达. 严子杰,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25.

⑧ DERRIDA J. Elisabeth Roudinesco, De quoi demain... Dialogue. Paris: Flammarion, 2003: 15.

⑨ DERRIDA J. Elisabeth Roudinesco, De quoi demain... Dialogue. Paris: Flammarion, 2003: 15-16.

⑩ 方向红. 幽灵之舞:德里达与现象学.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9.

⑪ DERRIDA J. Lettre à un ami japonais//Psyché. Paris: Galilée, 1987: 387-393.

满意于解构这个术语,但又苦于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因此只能从否定的方面来说解构不是什么,却无法从肯定方面来下一个定义,说解构是什么。接下来,德里达陆续指出:解构不是分析,也不是批判;解构不是一种方法,也不可归结为某些规则或者程序;解构不是一种行动或者操作……解构与结构有关,既是结构主义的,又是反结构主义的。在1986年的一次访谈中,德里达说道:“解构并不简单的是对于某种建筑结构的解体,也是相关于奠基,关于基础/被奠基的一种提问;相关于结构的关闭,相关于哲学的整个建筑。并不仅仅只是相关于这种或者那种建筑,而是相关于体系的建筑术动机。建筑术:在这里我参考的是康德的定义,但康德并没有穷尽‘建筑术’的全部含义,而且康德的定义令人特别感兴趣;建筑术是体系的艺术。解构首先和体系相关。这并不是说解构要打倒体系,而是开启了诸种安排和重聚的可能性,……因此这是一种关于体系的反思,关于体系的关闭和开放。”^①总之,解构是不可译、不可说的,因此德里达把它类比于某种否定神学的东西。在笔者看来,这种不可译性、不可说性、不可能性,才是解构和解构使之出现者。通过解构,使得某个无名的“这”(ça)或者“什么”(quoi)得以出现,但这种出现并不是一种完全消极的等待,而是要通过富有创造性的符号游戏,通过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阅读,使作为痕迹的书写得以开启并且运作起来。实际上,德里达本人并不是一个粗暴地对待文本的思想家,相反,他总是非常精细地阅读他要解构的每一个作家、每一个文本,他总是顺着文本既有的思路,但是他会将这种思路推向极致,通过这种彻底的思考,从而发现思想家本人没有发现的东西,使得文本获得新的生命活力。

四、德里达与伽达默尔的分歧

在概略地梳理了德里达关于诠释的思想之后,回到我们的问题,尝试分析两位哲人的分歧之所在。一定程度上,诠释的对象与诠释的方法,在德里达这里是书写与解构,而在伽达默尔处,则是文本与阐释。

关于文本,伽达默尔写道:“文本这个概念就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挑战。它又是把我们与我们的法国同行联结起来,或者也许是使我们与他们分道扬镳的东西。”^②对伽达默尔而言,文本是一个诠释学概念,“从解释学的立场出发,文本纯粹是中间产品,是理解事件中的一个阶段”^③。在海德格尔那里,理解(Verstehen)是此在的生存论结构的基本环节之一。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在这方面极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伽达默尔写道:“理解就是人类生命本身原始的存在特质。……海德格尔的彻底本体论思考就是这样一个任务,即通过一种‘对此在的先验分析’去阐明此在的这种结构。他揭示了一切理解的筹划性质,并且把理解活动本身设想为超越运动,即超越存在者的运动。”^④伽达默尔在《文本与阐释》一文中强调,在存在交流和理解的地方,双方总是有着某种善良意志。“凡在人们寻求理解之处,就有善良意志”^⑤。但光凭善良意志并不足以导致交流和理解的成功。因此,在伽达默尔看来,更重要的理由在于,在对话、交流、会话中,有可能构造出一种“意义共同性”,这种“意义共同性”的来源,最终归诸人与人之间共享的某种逻各斯或者理性。“逻各斯是为一切人所共有的,而不是他个人的逻各斯。”^⑥这样,文本对作为具有本体论地位的理解而言,就只是理解的一个阶段或者一个时刻(moment)。至少在理想的状态下,某种原初之物是可以通过文本被传达、被理解的。如果在主体之间能够建立起通畅、流利、透明的完美交流和理解机制,是不需要文本这一中介之物的。伽达默尔写道:“只有当这一状态受到阻碍,亦即理解不可能成功地进行之际,我们才会追问文本的原文字句,文本的建构才可能成为一项特别的任务。”^⑦这样,文本作为中介,其目的在于使这种理解成为可能,因此文本需要具有可读性。而

① DERRIDA J. Points de suspension. Paris: Galilée, 1992: 225-226.

② 伽达默尔,德里达. 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 孙周兴,孙善春,编译.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12.

③ 伽达默尔,德里达. 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 孙周兴,孙善春,编译.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17.

④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上). 洪汉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334.

⑤ 伽达默尔,德里达. 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 孙周兴,孙善春,编译.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20.

⑥ 伽达默尔,德里达. 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 孙周兴,孙善春,编译.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11.

⑦ 伽达默尔,德里达. 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 孙周兴,孙善春,编译.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18.

理解的目的,也就在于通过文本获得某种原初的消息。“我们因此就获得了一个概括性的概念,它是文本构造的基础,同时也揭示了文本向解释学联系的嵌入情况:任何向文本的回溯都意指着那个‘原消息’(Urkunde),即原初地被宣告或被公布出来的东西,后者应当被视为一个意义上同一的东西。为一切文字记述规定任务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点:这一‘消息’应当得到理解。……在这里,读者、接受者、阐释者的任务相应于书写者的任务,就是要达到这样一种理解,也就是让记述文本重新说话。就此而言,阅读和理解就意味着,把消息回溯到它原初的真实性。”^①

我们可以看到,对诠释的对象,伽达默尔和德里达显然有着极大的差异。对德里达而言,书写、文本只是一种痕迹,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一种书写或者一种文本的源头。书写既没有源头,也没有终点,而是一种意义不断自我延异、自我生发、自我差异的过程。文本一旦生成,就与作者割断了联系,因此,每一个文本都是某种程度上的遗嘱。另一方面,文本写作时,根本不知道其对象是谁,根本不知道这个文本是不是有读者,有哪些读者。书写或者文本本身皆有生命力,每一次阅读都是某种方式使之重新焕发生机,获得活力。

由此可见,伽达默尔和德里达对诠释的对象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正是因为诠释对象的不同,也导致了两人在诠释方法上的差异和分歧。让我们做一个假设:假设存在着一个原初消息,然后某人为了传递这个原初消息,通过文字形成一个文本。对伽达默尔而言,通过诠释学循环,通过深入地解读文本本身,以及尽可能全面和深入地考察诞生文本的历史文化语境,那么阅读者和写作者将可能达到某种视域融合。在这个视域融合之中,原初消息得以从写作者传递到阅读者。那么,对德里达而言,不存在这个原初消息,或者说通过阅读和诠释永远都不可能返回到原初消息。一切文本都是痕迹,文本是没有源头的,每一次对文本的阅读都是某种延迟、差异,这个原初的消息只可能是潜存的(virtuel),而永远不可能呈现为在场。在德里达这里,文本、书写本身是不透明的,无法被我们彻底地理解和把握,每一次解读都将是某种误读。伽达默尔乐观地认为,通过诠释学循环可以达到某种视域融合,从而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形成某种有效的理解和交流。在《解释学与逻各斯主义》一文中我们看到,伽达默尔一再强调他和德里达的“和而不同”,他写道:“惟有理解,书写才能返回到说……诠释学乃是把握某人真正想说的东西的方式。”^②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德里达根本不认为对作者的想说的把握是可能的,而且也根本不需要去把握作者的原初消息。因此,与其说两人殊途同归,毋宁说两人同源异流,渐行渐远。

根据之前的讨论,笔者认为,虽然在《公羊》一书中,德里达声称要与伽达默尔展开一场永不停止的“内在的对话”,然而并不能掩饰两人之间在诠释对象和方法上的巨大的分歧。在笔者看来,造成分歧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两人的出发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对伽达默尔而言,理解和诠释文本,最终是为了理解存在,因为“可以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③,从而他的诠释学最终是一种存在论。而对德里达,他所说的“文字”、痕迹、延异,先于存在者和存在并使之成为可能。德里达通过文字等概念,试图达到的是某种比存在论更为源初的一种哲学。因此,对德里达来说,他的解构是要通过阅读和思考,使文本原有的思路得以打开,并且使每一条思路都得以彻底化、极端化,从而揭示出文本之中不是只有一条康庄大道,而是一座“道路分岔的花园”,有着互相之间充满矛盾、张力和冲突的多种思路。

但是,如果从较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诠释学,那么在笔者看来,德里达的书写概念和解构方法可以引入到诠释学之中,用来丰富和深化诠释学。如果说伽达默尔更接近西方传统的语文学、古典学、修辞学传统,因此对于文本的态度也比较接近传统,那么德里达则通过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性发展,更深刻地揭示出文本本身的丰富性以及解读策略的复杂性。解构方法虽然看似激进和颠覆,却能够更深入地激发出文本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多样性和歧义性。实际上,激进的德里达对欧洲的文化传统饱含深情,他工作的很大一部分也在于对欧洲文化的重新解构和重新肯定,因此这种解构并不是为了导向一种否定和

① 伽达默尔,德里达.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孙周兴,孙善春,编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21-22.

② 伽达默尔,德里达.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孙周兴,孙善春,编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21-22.

③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104.

摧毁,而是要使传统在当代被重新唤醒并生成新的意义。就此而言,德里达和伽达默尔同样分享着对欧洲文化的深情,这种深情也许正是本文开头所说的,两人所共有的“奇怪而浓烈的分有”和“没有年代的忧郁”。对诗歌的解读最能够体现解构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也正是通过诗歌,可以重新架起解构思想和伽达默尔诠释学之间的对话桥梁,建立起德里达与伽达默尔两人间永不停止的对话。因此,德国学者马丁·格斯曼(Martin Gessmann)将《公羊》译成德文,与伽达默尔的《我是谁,你又是谁?评策兰的*Atemkristall*》一文合在一起,以《永不停止的对话》为题出版^①。在笔者看来,两人之间的对话,还可以扩展到哲学、政治、艺术等各个领域,从而这种对话可以永不停止地进行下去。这种对话也启示着我们,在广泛吸收两位哲学家在思想和方法方面的积极因素的同时,以一种开放的精神,通过对中国和西方传统的不断解读,在我们与传统之间永不停止地开展对话。

The Uninterrupted Dialogue:

Derrida's Dialogue and Divergence with Gadamer about the Problem of Interpretation

DENG Gang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were several significant dialogues and debates between 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 and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Gadamer has written some papers in order to probe into the difference and consensus between Derrida's idea and his own, while Derrida has published a book named *Béliers* in 2003, which started to response to Gadamer in terms of interpreting one of Paul Celan's poems. Although Derrida stressed that he would like to carry out an internal dialogue with Gadamer in the book, his approach was not able to eliminate the great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ir views on interpretation. For Derrida, the object and the method of interpretation are writing and deconstruction, whereas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for Gadamer. They have their own incompatible ideas on the object of interpretation, which exactly brought about their divergence in the methods of interpretation. Furthermore, this divergence consisted in total difference in the origins of their philosophies. In Derrida's view, *écriture* (writing), viz. trace and *différance*, is a core idea and the object of interpretation, which precedes *Sein* and *Seiende* and make them possible. By contrast, Gadamer considers the text as *Verstehen*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as a way toward the *Sein*. His hermeneutic philosophy is 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Heidegger's ontological phenomenology. Derrida's ideas on writing and deconstruction might be introduced in Hermeneutics to enrich and deepen it. Most of Derrida's work focuses on re-deconstruction and re-affirmation on European tradition. However, his deconstruction is not a mere negation and destruction but awaking up tradition to generate new sign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radical Derrida and the conservative Gadamer share the affection and passion on European cultural heritage. Interpreting a poetry is the best way to represent the flexibility and equivocality of deconstruction, and also the best way to rebuild a dialogue bridge across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Gadamer's Hermeneutics, an ceaseless dialogue between them.

Key words: Derrida; Gadamer; *Béliers*; Paul Colan

● 收稿日期: 2016-04-17

● 作者地址: 邓刚,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240。Email: dengphil@126.com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B018)

● 责任编辑: 涂文迁

^① DERRIDA J. Hans-Georg Gadmer, Der ununterbrochene Dialog. Frankfurt: Edition Suhrkamp, 2004.